

## 何焯《文選》學的梳理與試探 ——從「何校」與「何評」的釐正談起

張為舜\*

### 摘 要

黃焯〈文選平點敘〉盛贊：「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何焯儼然為清代《文選》學的標竿，其《義門讀書記》是後學窺入《文選》的重要參考之一。過去學界過存何焯的學術表現，並未關懷清代學者對其的批評，而筆者檢視到後學對於何氏《文選》學有所批評，質疑聲音不可不察。

由於完帙作品僅存《讀書記》，並不能全然代表何焯，而本研究透過比對各家散落資料，理解讀者所見不全，各執一詞；但從批評又可從而理解清儒是秉持「事必有徵，義必有本」的「考據」理念，對何氏《文選》學提出批判的聲音。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漢學」視域的主張，解釋乾、嘉《文選》學家檢正何焯的意義，並藉此讓我們更深入了解清代《文選》學的時代訴求。

**關鍵詞：**何焯、義門讀書記、何校、何評、清代文選學

---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生。

**Organize and observe on He Zhuo's erudition of *Wenxuan*  
— — Star with distinguish proof and comment by He Zhuo**

Chang, Wei-Shun

**Abstract**

Huang Zhuo's "The Evaluate Selected f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praised: "The top study of *Wenxuan* only He Zhuo (何焯) in the Qing Dynasty." One of important documents that named *Reading Notes by Yi-Men* (義門) is wanting to learn *Wenxuan*. In the past, no one paid attention to fault on He Zhuo, in fact, some people criticize him in the Qing Dynasty. So, this report observed that thinking this matter is important.

The complete word in *Reading Notes by Yi-Men* but not at all. This report organize each scholars information that everyone is different, but scholars think it different needs to "text must appear in books & explanation must appear in classics" to appear. So be more rigorous to check He Zhuo and his note. Therefore, this report hopes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what they wanting in sinology, and by knew to persist in *Wenxuan*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He Zhuo, *Reading Notes by Yi-Men*, proof by He Zhuo, comment by He Zhuo, Qing Dynasty *Wenxuan*

## 一、引言：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sup>1</sup>

清代學術昌明，大量典籍受到整理與勘正，是前代學術成果所無法比肩的，一切歸功於清人願意盡日窮夜地挖掘與發明。<sup>2</sup>其中何焯（1661—1722）對於《昭明文選》（後續再提均稱《文選》）承先啓後，頗有考究，深受清人所推崇，諸如：余蕭客（1732—1778）《文選音義·自序》：「前輩何侍讀義門先生，……，博攷眾本，以汲古爲善，晚年評定……士論服其該洽。」<sup>3</sup>葉樹藩（？—？）〈重刻文選序〉：「吾吳何義門手評是書，於李注多所考正……。」<sup>4</sup>孫志祖（1737—1801）〈文選考異序〉：「國朝潘稼堂及何義門兩先生，並嘗讎校是書，而義門先生丹黃點勘……。」<sup>5</sup>張雲璈〈選學膠言自序〉云：「義門先生考覆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學者宗之。」<sup>6</sup>等二十餘者，即說明「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的地位。<sup>7</sup>

---

<sup>1</sup> 按：該語出於黃焯（1902—1984）〈文選平點敘〉，但駱鴻凱《文選學》稱「本師黃氏（侃）云。」大抵可推測爲黃氏對於何焯的推崇，逮從黃焯、黃念容、黃廷祖均承其先君黃侃說法，未有離異，可看作黃氏一家之私見。見（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4。

<sup>2</sup> 丁旭輝〈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一文歸納進人闡述清代考據學術昌明之因，其中第二點「社會經濟、統治者支持說」與第七點「整理國故、家學說」較切合整體時代發展脈絡的主因。參《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第3期第10卷，（2004年9月），頁109-120。

<sup>3</sup>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冊，頁10。

<sup>4</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30。

<sup>5</sup> （清）孫志祖：《文選考異》（清·嘉慶間刻讀畫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6冊，頁557-558。

<sup>6</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247-251。

<sup>7</sup> 此據《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統計，共計107人，提及何焯者共21人。參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8。

而欲了解何焯《文選》相關成果即目前《義門讀書記》（後稱《讀書記》）。首先，《讀書記》成書方面極為多舛，其侄何堂〈序〉言：「取攜狼藉者有人，而書以佚散，喪舟南歸，書麓半浸於水，而書以腐敗破缺。」又其侄孫何忠相〈誌〉言：「康熙壬辰捐館舍，遺書充棟，……，書賈百計購，評本風馳電捲，百無三四存，其得之者強半皆維揚富人，秘不出。」<sup>8</sup>不論是遭掠受購，再再揭示何焯的成果是受到學界肯定的，才有如此遭遇。惜當時其子何雲龍甫九歲，無法守住父親一生努力修築的學術成果，逮及長成才意識到父學之價值。

其次，現存紀錄相當駁雜破碎。觀察今本通行的四庫本《讀書記》來說，當中鮮少版本校勘的案語，較多的是評點與注解的補充；但是從其他清儒的著作中卻不乏尚存校勘、注音等紀錄，加上《文選集成》也提及「何義門著有《文選音義》」<sup>9</sup>，這顯示何焯的《文選》學應有一體之四面：一面是以對讎各版本為主的「校《文選》（後稱「何校）」，一面是針對《文選》文章評點的「評《文選》（後稱「何評）」，一面則是針對當時清代通俗的讀音「注《選》音（後稱「何音）」，再一面則是對於注解疑慮或錯誤的「再補充」（後稱「補注」）。而四庫本之「何校」、「何音」不幸地在後學集纂時被剷除了。

雖然《讀書記》不甚完整，但並不影響清儒推崇何焯，究其原因還是何焯在於《文選》「版本」貢獻。我們知道，《文選》在唐代有李善注與五臣注兩家注解，迨至宋代，「刊刻」天聖道明國子監李善單注本或平昌孟氏五臣注本，但單注本均不及合併兩家注解的「六家本」、「六臣本」來得實用、流行；但「六家」、「六臣」的體例略有小異，加上歷經宋、元、明三朝刊刻主事者嚴謹不一，導致正文與注文錯訛，或是兩家注解

<sup>8</sup> 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 1285-1288。

<sup>9</sup> 參（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 9 月），第 1 冊，頁 27。

相互淆亂，之中刪減漫增更是隨著歷來每一次的刊刻而擴大問題。<sup>10</sup>所以《文選》的版本迎來開枝散葉，同時也走向紛亂的局面。

何焯在版本學上的貢獻，本研究認為有二：一者在於以「汲古為善」<sup>11</sup>；所謂「汲古閣本」即明末毛晉所刊之「李善注本」，溯其祖本為「南宋尤袤的池陽郡齋刻李善注本」，即清人常言「從宋本校正」；<sup>12</sup>而學者認為何焯係以錢士謐本作為底本，與流通之袁本（六家本）與茶陵本（六臣注）等本相互校參的成果。<sup>13</sup>這件事情在清代具有時代性的意義，標誌何焯在版本上以李善本為宗的選擇。二者是何焯名氣橫貫當時朝野，上自四庫館臣的「文章負盛名」，<sup>14</sup>下自學友「失職仍校書內廷、書籤壓架，校讎再三、分辨而補正之，校訂……」<sup>15</sup>等云云，不論是文章抑或考證都受到當代肯定，其話語之權不言而喻。故清人基於版本迷思與名人效應，認為此刻為善，<sup>16</sup>也造就「今學士家羣奉何義門校本，競相傳寫。」<sup>17</sup>諸

---

<sup>10</sup> 版本問題可參：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8月），頁230-300；王立群：《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8月），頁105-339；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43-223；劉鋒：《文選校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頁53-110。

<sup>11</sup>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頁10。按：該論點廣受清人採納，俱見於孫志祖、張雲璈、梁章鉅等學者，民初黃侃、駱鴻凱也持此見。

<sup>12</sup>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第54冊，頁92-97。

<sup>13</sup> 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總頁1377-1382。

<sup>14</sup>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第33冊，頁149-151。

<sup>15</sup> 參方榮如：〈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收於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1281-1283。

<sup>16</sup> 按：汲古閣本的底本來源至今尚未定論，據斯波六郎譜系，可能源自南宋尤袤的刻本。然傅剛認為汲古閣本分三十九類文體與陳八郎本同，相關版式、缺訛與尤本之後的張伯顏本不同，疑非同一系統，而是透過五臣本與其他六臣本相互校參的成果。參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91-194。

<sup>17</sup>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21。

如「借觀不獲」<sup>18</sup>或「學友相借」<sup>19</sup>仍頻，甚有「偽作」之說法。<sup>20</sup>因此，經何焯所校勘的《文選》，在士林間傳為佳作。<sup>21</sup>

何焯成果為清儒所炙熱，自然成為學者們參考或採納的對象，韋胤宗統計《文選》學方面：余蕭客（1732—1778年）《文選音義》千餘條、許巽行（1727—1798？）《文選筆記》680條、梁章鉅（1775—1849）《文選旁證》650條。<sup>22</sup>而本研究觀察清代專論《文選》學者，諸如：孫志祖（1737—1801）、徐攀鳳（1740—1803）、張雲璈（1747—1829）、胡克家（1757—1816）、薛傳均（1768—1835）、朱珔（1769—1850）、梁章鉅（1775—1849）、胡紹煥（1792—1860）等，約莫10餘家均承何氏校勘之膏腴。

<sup>18</sup>（清）汪師韓：《文學理學權輿》（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6冊，頁12。

<sup>19</sup>許巽行曾於乾隆19年（1754）透過曹錫寶（1719—1792）見到何焯的抄本，對校後定名「癸亥本」。參見許氏〈密齋隨錄〉，（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21-23。

<sup>20</sup>全祖望於〈翰林院編脩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載：「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偽書……。」參（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新北市：台海書版社，1988年3月），頁723-724。

<sup>21</sup>何焯不論是手本、批校本等成果均未剝削，又據弟子沈彤表示某同門擔心何焯批案言詞過激，可能招致忌諱，進而盡數焚銷等事。可知，何焯的成果一定程度上不僅未公開流傳，甚至不全、殘缺都是可以想見的。何氏的手本，或更精確說當時在古本上頭圈點批改校訂的案語或校勘記是破碎且不全的，今天崔高維重修出版的《義門讀書記》或四庫全書本所留，均非何焯批校時的原貌，從于光華（1727—？）〈重訂凡例〉亦可得知：「義門先生《文選評本》，凡三易稿，故或記年、或用曰以別之，世所傳寫，皆晚年所定。」然《文選集評》也有問題，雖保留大量明、清時人對於《文選》的批評，但該書刪去大量李善注、五臣注等眾家古注，僅偶爾抄錄幾條，並重修出版，板式亦非傳統60卷樣式。所以不論是葉樹藩，乃至于光華所過錄何焯評語均殘缺不全，也不能完全視作何氏的全貌。今本《義門讀書記》可參（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22</sup>韋胤宗：《浩蕩遊絲：何焯與清代的批校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8月），頁174。

足見清代學者對何焯的推崇，無疑為後代《文選》學家提供考證「方向」。甚於近代《文選》學頗受黃侃、駱鴻凱系統推崇，地位穩固。<sup>23</sup>而筆者長期關懷清代《文選》學，發現清代批評何焯者不在少數，如徐攀鳳：「方為有據、未免臆撰少佐證、<sup>24</sup>導人詞章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織。<sup>25</sup>」張雲璈：「失於點勘、<sup>26</sup>未翫賦之本文耶。<sup>27</sup>」朱珔：「陞，乃階級之名與此殊不合，『何說未可從』。」<sup>28</sup>許巽行：「何校未為是也、<sup>29</sup>而遂輕信庸妄之五臣、<sup>30</sup>何所指乎五臣注：良書，先王典籍也。荒謬可笑。<sup>31</sup>」等。

同時，本研究也觀察近人解釋何焯的學術缺失，如黃侃之侄黃焯即析離何焯在《文選》學上的缺失有三：「時代高下之見」、「體裁朦朧之見」、「時文門法之見」，<sup>32</sup>主乃何氏未擺脫明儒的評點風氣，不能深囿《文選》文體與文類之間的差異，且以隋唐以後之作品比較《文選》，犯了部分清

---

<sup>23</sup> 黃侃、黃焯父子對何焯大家推崇，故身為學生的駱鴻凱承師庭訓，其《文選學》並未有太多批駁。參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58。後續學者仍有關懷，較著名者如穆克宏：《六朝文學研究》，收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叢刊（第一輯）》（台北市：萬卷樓圖書，2018年9月）；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9月）；王書才：《文選評點述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sup>24</sup>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1。

<sup>25</sup>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6。

<sup>26</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429。

<sup>27</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7冊，頁702。

<sup>28</sup> （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頁239-240。

<sup>29</sup>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18冊，頁327。

<sup>30</sup> 《文選筆記》，第18冊，頁334。

<sup>31</sup> 《文選筆記》，第18冊，頁489。

<sup>32</sup> （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4。

儒認為之「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sup>33</sup>另，學者穆克宏認為何焯「不長於考證」，對於古注「未詳、待權」等條目所提出的看法頗多淺薄，如〈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即採五臣之說，而未「知其詳者當確指何時何地之人，方為有據。」又如〈魏都賦〉「量寸旬。」直言「未詳」而不加以考據；<sup>34</sup>而評論恪承宋、明儒的評點學風，較屬於個人觀點，如評〈海賦〉：「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評〈江賦〉：「與〈海賦〉才力懸絕。」<sup>35</sup>等。因此，穆氏認為何焯粗淺的觀點適合「初學者」參看；另如學者范志新認為何焯是立於藏書家、目錄家的史家視角對《文選》進行「以史正《選》」的詮釋，文字、音韻之學不如乾、嘉學者來得深厚。<sup>36</sup>

何焯整體學問評價兩極，質疑揭示當代人對於何焯學術的「異聲」，值當考察其訴求。鑒此，筆者從中思索一條理路，發現這些評價幾乎與「評點」息息相關，而評點與「考據」又恰恰是兩種不同的治學方法，是否學者間對何焯的學問有所誤解？是故，本研究認為有重新探討何焯的校勘成果與《讀書記》一書之必要。

由於《義門讀書記》本身的版本問題相當濛混，且我們也很難確立清人掌握版本係初刻、重刻、翻刻、影刻，抑或初印或後印等問題是否忠實，因此不可能單以一篇小論文盡述詳說地討論。但我們可以由所謂「何校」與《讀書記》之差異先行著手釐正，了解兩造差異的本質後，即可進一步理解學者所見不同，造成對何焯學術有所「誤解」；再進而藉著這些「誤解」的解析，理解當代對於學術嚴謹的訴求表達。其實，何

<sup>33</sup>（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頁509。

<sup>34</sup>兩條均不見於今崔氏點校本、于光華評本、黃侃批校本、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等。可參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91、196。

<sup>35</sup>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頁875。

<sup>36</sup>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8-9。

焯用力乃「凡三易稿」<sup>37</sup>到學界「競相傳寫」，當中必定有所落差，而這落差即在於學者間所見不一，故有認知落差而提出質議，故此無疑為清代《文選》學研究之重要議題。最後則可肯定——「清代《選》學未有超於何氏」的評語是經得起驗證。

## 二、凡三易稿，多有未載：「何校」與《義門讀書記》差異釐正

### （一）「何校」與《義門讀書記》之間的差異

于光華談及何焯，言之：「《文選》評本，凡三易稿。故或『記年』，或用『又曰』以別之。世所傳寫皆晚年所定。初次則支分節解，於初學尤宜。」<sup>38</sup>何焯的資料不僅有版次差異外，且其中最初的版次是最適合初學者學習《文選》，可見于光華係有見過初稿與後續版次。但瀏覽通本《文選集評》是否有上述義例？答案是否定的。《文選集評》通書全作「何曰」，甚至在其他學者著作中也未見有者以「記年」、「又曰」別之。這顯示何焯的資料其實是有受到「佚失、修改」的可能，以致後學方東樹（1772—1851）於第三十七卷《文選》註明「多有未載」。<sup>39</sup>並且《援鶉堂筆記·槩誤》言：「何氏出後人竄次，不得其措，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sup>40</sup>方氏語焉甚明，《讀書記》是受「後人代為處理的結果」，最初的案稿已跟著何焯離世一同散失，故對於後進展出的新穎資料俱不進採，面對《義門讀書記》與後出資料，實是採保留態度。

這顯示何焯「原本」在流傳之間有著「紀錄缺少」、「紀錄落差」與「去取不一」的「不確定性」，但我們仍可從清儒的記敘梳理一條脈絡，

---

<sup>37</sup> 按：「凡三易稿」著見清儒紀錄，諸如姚範《援鶉堂筆記》、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等，此略提一耳。

<sup>38</sup> （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39</sup>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第五冊，頁1321。

<sup>40</sup>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第八冊，頁2054。

即如前文所言「一體之四面」。故此段分別由兩個面向：「何校」與「何評」來觀察，以作差異釐正。同時借鑑駱鴻凱在《文選學·源流第三》的分野，開篇上自何焯，終於李詳等二十餘家較著重「考證」，因此「何校」的資料較受此類學者採錄；次類為評點、摘字等非考據的學者著作歸類成一派，約莫十家，採錄較多「何評」，作另一觀察。這邊尚須了解「何校」與「何評」雖性質不同，但並非不會同時受到採錄，而是依照各家收錄的需求進行採納，如張雲璈《選學膠言》、梁章鉅《文選旁證》大部分以討論「何校」為主，兼有幾條「何評」；又如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于光華《重刊文選集評》本就屬於評點類書，著重「何評」也是理解之內，但仍可見「何校」的痕跡而未署名，故值當釐正兩造差異。

### 1. 首先觀察「何校」

「何校」因涉及考據「汲古閣本、袁本、茶陵本」等複雜的版本差異，內容廣受清儒引用（詳見前文），故在清代《文選》學之中相當廣見。由於何焯的原稿目前已經佚失，透過《讀書記》也不易知曉它的原貌，但是通過各家抄錄的條案，還是能推測它的雛況。

何焯離世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庫本《讀書記》刊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聲稱取得於刊時之前者尚有姚範（1702—1771）《援鶉堂筆記》、許巽行（1727—1798？）《文選筆記》、余蕭客（1729—1777）《文選音義》等三家。

許巽行《文選筆記》尤為重要，不僅為清代鮮為人知的校勘《文選》之專家，同時也遍覽當代著作之見證者。自乾隆壬戌、癸亥間（乾隆七年至八年間 1742-1743年）受學於華亭髣髴山房，始涉略《文選》，認為坊間刊本譌異不可讀，遂有校讎之心；一生蒐羅各家版本，涵蓋張伯顏本、養德書院本、汲古閣本、錢士謐本、葉樹藩本、上蔡劉氏本等；<sup>41</sup>另

<sup>41</sup> 「上蔡劉氏本」鮮少學者提及，但仍著見《天祿琳琅後編》之中，除闕袁裝識語外，並偽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上蔡劉氏刻，實際為袁本系統。參劉薈：〈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年1期（總第42

當代學者之著作，如余蕭客《文選音義》、于光華《文選集評》、方廷珪《文選集成》等作均有參考提及。直至戊午年間（嘉慶三年 1798 年）勒停，將草稿交付子孫，時年已七十有二。長達約 55 年的時光，許巽行幾乎都在處理《文選》的版本問題，其校勘力度絕不亞於何焯、胡克家等輩。但《文選筆記》本屬於「私家藏本」，且刊刻不易、耗費資繁，其玄孫——許嘉德表示：「繕稿亦已有年，竝經開雕十於卷，而一再校讎……旋校旋輟，未得專心，工資亦極浩繁，祇好舒之異日，……，筆記八卷先付剞劂……。」<sup>42</sup>故直至光緒十年（1884 年）才繕工。其中，許巽行於〈附識〉言：

何氏校正甚少，余曾假曹劔亭手抄本鈔之。復廣求刻本及證之他書，蓋所校證比於何氏為增益云。……甲戌年（1754）在京師從曹劔亭借得何義門先生校本，手錄一過互為校正，此癸亥（未）本也。<sup>43</sup>

上述記錄透露此時許氏所借抄的「何校」記錄甚少，且相當粗淺，故廣求其他「版本」復證，由此可視為何焯較早期的版次。

再者余蕭客其《文選音義》刊行於乾隆廿三年（1758 年），全書其實未表明取得何氏資料的「確切時間」，但與何焯同為「吳人」（江蘇蘇州），

---

輯），頁 309-316。

<sup>42</sup>（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18 冊，頁 6-7。

<sup>43</sup>（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18 冊，頁 21-22。按：清代癸亥有四：康熙二十二年（1683）、乾隆八年（1743）、嘉慶八年（1803）、同治元年（1863），許氏生卒為雍正五年至嘉慶三年（約 1727-1798）；該文「此癸亥本也」下句為「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 年）官浙東」，若前文以言「甲戌年（1754）在京師，此乙酉只能為或道光 5 年（1825 年）。時序與生卒均明顯無法吻合。故筆者認為：此「癸亥」當改為「癸未」，也就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校勘九年；後「乙酉（乾隆三十年，1765 年）官浙東……此丙戌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得葉氏刻本（刻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此甲午本……丁酉（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官粵西……。」較為合理。

亦與何氏門人沈彤互為友好，可視作同一學圈。且《文選音義》係清代《文選》學中收錄「何校」最多者，其〈序〉言：「晚年評定……據何為本，蓋以所聞，摘字為音。」<sup>44</sup>開宗明義告訴「據何為本」且係有「評定」之本；此外，全書成立的目標明確，主在處理單字、注解的「音與義」，故除了「何校」外，尚收錄大量「何音」，也證實何焯曾據清代較為通行讀音加以註解的事實。

最後，姚範《援鵝堂筆記》雖刊於道光 15 年（1835 年），但據方東樹後記案語：姚氏係據「何義門原本」，續下又補充，「何校凡三易稿，今刊行《讀書記》多有未載，並附錄用備一家之說……。」<sup>45</sup>表明其所見的何焯資料與四庫本《讀書記》略有出入，可能是較為早期的版本，故先行註記，以便後學取用能夠複校。尤其姚氏收錄的「何校」資料與余蕭客略有重疊，但是方東樹在彙誤時也表明「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認為越早期的文獻越有可信度，不只暗斥坊間流傳的何焯資料有「偽作」之嫌外，更間接表示其所取得的資料可能更早於其他學者。因此，三者都值當列入觀察。

以下，即根據上述三家參考何焯於〈吳都賦〉各方面之概況，經統計而製成下表，以方便觀察與說明。

表一、《文選筆記》《文選音義》《援鵝堂筆記》徵引何焯概況

| 著作      | 〈吳都賦〉參考條目分類 |    |    |    |    |        |
|---------|-------------|----|----|----|----|--------|
|         | 何校          | 何音 | 何評 | 補注 | 總數 | 四庫本重疊數 |
| 《文選筆記》  | 4           | 0  | 1  | 1  | 6  | 0      |
| 《文選音義》  | 12          | 8  | 0  | 11 | 31 | 3      |
| 《援鵝堂筆記》 | 8           | 1  | 0  | 5  | 14 | 2      |

從上表，可以知道何焯在《文選》方面下了那些功夫，確實包含「何校、何音、何評、補注」等四種；其中，許巽行引「評點 1 條、校字 4

<sup>44</sup> 《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10。

<sup>45</sup> （清）姚範：《援鵝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 年 8 月），第 5 冊，頁 1321。

條、補注 1」、余蕭客「補注 11 條、校字 12 條、注音 8 條」、姚範「補注 5 條、校字 8 條、注音 1 條」。對檢與四庫本的關係：《文選筆記》錄 6 條，均為四庫本所無；《文選音義》錄 31 條，僅 3 條與四庫本合；《援鶉堂筆記》錄 14 條，僅 2 條一致。

以下再根據三者於〈吳都賦〉所徵引何焯之細目略作說明。

表二、《文選筆記》《文選音義》《援鶉堂筆記》徵引何焯細目

| 學者            | 參考何校條目   |
|---------------|--|
| 許巽行<br>《文選筆記》 | 之岳、駢脇、弛岑、闕子曰、揮戈、庶士   |
| 余蕭客<br>《文選音義》 | 吳都、論都、干越、湯、瀛、鯀、食葛、東風、挈、埴塢、餘甘、綵、歲、窠、武昌、魏、睽、俞騎、旄、蘧、殺、而飲、鱧、圖其、魏尉詩、小城、漢書曰太、不樂徒、虞丈秀、白豹、北征闕池 |
| 姚範<br>《援鶉堂筆記》 | 吳都賦、風俗、武林、鯀、扶留、殫葉、驚透、武昌、純鈎、驢驪、駢脇、殺、邪睨、誣詭   |

由上可知，許氏徵引條目與余、姚幾乎不同；而余、雙方僅 5 條相似。進一步檢視，以〈吳都賦〉「旁魄以論都邑」為例，即余蕭客「論都」條，言：「六臣有邑字。何引潘（耒）云：『都字衍』。」該條許巽行亦有，言「六臣無都字，以『旁魄而論』絕句。」無署名何焯或潘耒。<sup>46</sup>又如《援鶉堂筆記》「驢驪」條，言：「何去馬旁。」《文選筆記》亦有，但僅作：「《左傳》作肅爽；《釋文》爽或作霜，均不加馬。」無署名何焯。<sup>47</sup>又如紀錄落差者，《文選筆記》「駢脇」條，言：「何改駢，以駢為非。」《援鶉堂筆記》言：「何云當書作駢。」<sup>48</sup>

<sup>46</sup> 《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76；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0。

<sup>47</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5；姚範：《援鶉堂筆記》，第 5 冊，頁 1349。該條《文選音義》亦有，但僅著錄「驢驪」二字音同「肅爽」，無提及何焯。參《文選音義》，第 1 冊，頁 81-82。

<sup>48</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86；姚範：《援鶉堂筆記》，第 5 冊，頁 1349。該條《文選音義》亦有，言：「劉（淵林）注：『駢、駢通。』脇，通脅。」，無提及

上述兩表雖僅擷取〈吳都賦〉的條案作為參考，但統觀來談：不論是那位學者或是那本著作，何焯的資料確實包含「何校、何音、何評、補注」四種，或許在《文選筆記》中看不到何音，係因為何音屬於「讀若」的方式，但徐氏所求為「反切」，故遽而不採；《文選音義》一書雖表明取「音與義」，但通書仍有何評，《援鶉堂筆記》亦是。因此，學者也並非盲目取用，而是依照各家學術上的需要進行採納，故各家之間略顯差異。

## 2. 其次再觀察「何評」

《讀書記》本身以輯錄「何評」為主，在出刊後（1769年）也陸續有不少學者聲稱「取得何焯文獻」，諸如葉樹藩《重刻昭明文選李善註》（簡稱《文選補注》，刊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于光華《重刊文選集評》（簡稱《文選集評》，刊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駱鴻凱作《文選集成》，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sup>49</sup>這三家的特性在於「採錄義門評點」。

第一，《文選補注》雙桂堂本封面即落款「義門先生評點。」駱鴻凱補充：「星衛是書成於乾隆三十七年，蓋據汲古閣本，以宋本校訂，全採

---

何焯。參《文選音義》，第1冊，頁84。

<sup>49</sup> 方廷珪所撰《昭明文選大成》（一作《昭明文選集成》）據學者統計共有5版，目前以乾隆四十八年（1783）吳天爵重訂之增補本六十卷（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5年出版，暫稱「增補本」），以及民國十四年（1925）碧梧山莊石印本廿四卷（今數位典藏臺灣大學圖書館，暫稱「碧梧本」）兩本較易取得。筆者初步比較兩版差異，共有六處不一：1.朱珪〈離騷題詞〉，增補本一作甲申，碧梧本一作甲辰。2.增補本，〈方廷珪自序〉無落款干支，碧梧本有。3.凡例增補本作13則；碧梧本作15則。4.兩造採錄何焯評語略有差異。5.「增補本」天頭處特增框格，用以填入評語，但諸多未填，疑似未盡完備。6.「增補本」特增于光華等20餘家評語，葉面稍架。綜合考量下，碧梧本雖較為完整，且採錄評語單純，但增補本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距參考對象較近，故以之為準。參（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9月）。（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本，1925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

義門評點。」<sup>50</sup>而檢視葉本，確實除了何焯評點外，無見諸家評語。第二，《文選集評》更有參考葉樹藩與方廷珪等家，乃至前明學者張鳳翼、孫鑛，並進一步言：「丙戌（1766 年）……於羊城旅邸得見初次評本，……均奉義門為標的心理之同，遙相吻合，藉此以証知己。」<sup>51</sup>〈凡例〉言：「即據（何本）為藍本，并集諸家評論。」<sup>52</sup>第三，《文選集成》其實早刊於《文選集評》，但目前較為流通者僅陳雲程之增補本，刊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該版卷首題署「古榕方伯海評點原本、金壇于惺介採輯評註」，且〈增補例言〉明確指明：「何義門（焯）、孫月峯（鑛）二先生評論精確，採錄最多，而餘則略從，一仍于本之舊。」<sup>53</sup>

以四庫本「〈吳都賦〉」所收 16 條補注與評點，對檢三家情況（如下表）：

表三、〈吳都賦〉參考條目數量與四庫本重疊數

| 著作     | 〈吳都賦〉參考條目數量 | 與四庫本重疊數 |
|--------|-------------|---------|
| 《文選補注》 | 29          | 11      |
| 《文選集評》 | 41          | 8       |
| 《文選集成》 | 32          | 9       |

《文選補注》29 條，重疊 11 條；《文選集評》因收錄多家，故僅對署名「何曰」的條目者統計，達 41 條，重疊 8 條；《文選集成》32 條，重疊 6 條。此處陳雲程雖參考《文選集評》，但《文選集評》正文之間另有補充「何注」，此部分《文選集成》俱將剔除，故經統計有短少 9 條。同樣

<sup>50</sup> 駱鴻凱《文選學》，頁 63。

<sup>51</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3 冊，頁 53-55。

<sup>52</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 年 11 月），第 3 冊，頁 45。

<sup>53</sup> 參（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付印昭明文選大成例言〉（碧梧山莊本，1925 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頁 38。

地，《文選集評》對比《文選補注》也僅 12 條重疊。

以表格數據分析，《文選補注》與四庫本最接近，加上該本僅晚出四庫本約 3 年，按理是最有可能接近何焯原本。但最接近者卻有不少條目不受後學採納，變成一個怪異的現象，即各家寧可「保持」自己取得的何焯文獻，也不願意「增補」後來出現的資料，而這個現象俱現於許巽行、姚範、方廷珪、于光華等人身上，是否也坐實「多有未載」的「偽作」可能？

再進一步由紀錄差異檢視，如下表：

表四、《文選補注》《文選集評》《文選集成》採錄〈吳都賦〉何評差異對照表

|    | 《讀書記》  | 《文選補注》   | 《文選集評》                          | 《文選集成》                          |
|----|--|--|---------------------------------|---------------------------------|
| 原文 | 此儼上林而尤為寡要。   | 此篇似儼上林而尤為寡要。   |                                 |                                 |
|    | 太涉樞儼，<br>似有冗長散緩之失，<br>然採其數語，<br>便可成一賦，<br>如：<br>子山、枯樹是其徵也。 | 吳都太涉摹擬，<br>似有冗長散緩之病，<br>然采其數語，<br>便可成一賦，<br>如：<br>子山、枯樹是也。 |                                 |                                 |
|    | -----  | 蜀是矜其險阻，<br>吳是詔其繁華，<br>用意微別，                                | 何義門曰蜀是矜其險阻，<br>吳是詔其繁華，<br>用意微別， | 何義門曰蜀是矜其險阻，<br>吳是詔其繁華，<br>用意微別， |

|  |  |   |   |   |
|--|--|---|---|---|
|  |  | 與吳之折蜀處，<br>全在境之廣狹上<br>著想，<br>故務以曼衍爲<br>工。 | 吳折蜀處，<br>全在境之廣狹上<br>著想，<br>故務以曼衍爲<br>工。 | 與吳之折蜀處，<br>全在境之廣狹上<br>著想，<br>故務以曼衍爲<br>工。 |
|--|--|---|---|---|

上表屬於「紀錄落差」與「去取不一」最爲顯著的例子。以四庫本爲參照基準，《文選補注》、《文選集評》、《文選集成》不論在用字、刪節部分均有落差。尤其在《文選補注》中，另增有「蜀是矜其……」一段，似乎又未祖述何焯，但《文選集成》、《文選集成》與之同。再仔細檢對，可以發現「蜀是矜其……」三家皆同；惟《文選補注》錄於天頭，但不署名；反之，《文選集成》、《文選集評》錄於界行，並開頭署名「何義門曰」。

類似例子又如四庫本「鸞鷲」，何評：「二句無乃亦玉樹、海若之流。」《文選補注》同之，《文選集評》、《文選集成》前另有「何曰草木以後，兼寫竹菓二段」共 53 字。又如「魯陽揮戈而高麾」，四庫本、《文選補注》、《文選集成》俱無，而《文選集評》有之。又如《文選補注》「作離宮之建業」，何評：「吳之建業……後賦作地。」文中，《文選集成》、《文選集評》有「特表姑蘇」4 字；句中「筆法絕妙」，《文選集成》、《文選集評》作「何等筆法」；句末「不樂徒乃孫浩時事」，四庫本有，而《文選集成》、《文選集評》無。

綜合上述，《讀書記》本身的問題顯而易見，其所收錄的資料與清儒的引用有著極大落差，而「刪改權」還取決於收錄者的喜惡；換言之，何焯的稿本早已濛昧不清，含括學友的抄錄、士林的掠奪、商賈變造之真偽，種種現象都反映在各家之上。由是，進一步推得兩個論點：一是「何校與何評可能同時並存」，從許巽行《文選筆記》、余蕭客《文選音義》、姚範《援鶉堂筆記》三家所呈現的差異，推論各家當初取得資料時，

文獻上頭不僅有何焯對於版本對校的按語（何校），以及對於文章品評的評點（何評），但採錄基於不同的學術需求而有不同的呈現；二是「何焯的資料有受到各家取捨與修改」，從四庫本與眾家記錄不同而呈現「紀錄缺少」、「紀錄增多」與「去取不一」，可進一步得知各家對於資料的修改或增刪。此也呼應《文選集評》所言：「此係後人假託，然是非得失，有識者自能辯之。<sup>54</sup>」是故，回到方氏所言「後人竄次」的問題，不管是子弟編之四庫本，抑或後續學者所輯佚，都有一個核心問題——「是否忠實何焯」。

## （二）何焯與《義門讀書記》的關係釐正

由前文所證，何焯確實在《文選》上下足功夫，含括校勘、注釋、評點，其功確如前人所贊——「未有超越」。但是，何焯的文獻資料破碎四散，今日之所見實為後學輯佚，成品體現在《讀書記》。那麼《讀書記》是否能全然代表何焯？甚至劃上等號？這是需要釐正的一個觀念。

駱鴻凱〈評鷺第八〉寫道：

評文之言，歷代歧迥，是丹非素，門戶紛然，悉取雜陳，誰為準的？稍求謹慎，祇宜取當代之言……，世近彌甚，益滋異議，坊本所見，若方廷珪《集成》、于光華《集評》之屬，泛采雜徵，編者自矜善本矣。然大都以時文之窠臼，繩墨古人，塵穢簡編，謬以千里。<sup>55</sup>

駱氏批評清儒評點係墮入「時文窠臼，繩墨古人」，認為清儒是以自我觀點註腳古人文章，沒有一個既定標準，皆是以「帖括（八股）」視角審視《文選》，成就一種「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為經學，以類書為博聞。」<sup>56</sup>的糜敝之風，並非是治研《文選》學之根本。如果我們重新梳理

<sup>54</sup> 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53。

<sup>55</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169。

<sup>56</sup>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

這段話，會發現駱鴻凱是立於一個經學家，甚至一個漢學家的「考據」視域去評價《文選集評》、《文選集成》等評《文選》之書，但其書卻逕以《讀書記》列於考據之首。而本研究在前文所羅列的《讀書記》概況是以「評點」為重，而非考據。這種盲目將何焯與《讀書記》劃上等號，即衍生如「前言」所提徐攀鳳評言：「未免臆撰少佐證、導人詞章固可、失於點勘、而遂輕信庸妄之五臣」及同如張雲璈屢陳述《讀書記》作為批評依據。所以士林盛傳何焯善於「考據」，但現實成書卻是「評點」居多時，自然擋不住各家的指責。

職是之故，如果重新梳理該書命名的本質——《義門讀書記》，輒乎告訴讀者：此書為何焯之「讀書筆記、札記」，它自然一定程度沒有專著來得嚴謹，更不遑此書編輯者在整理上特意刪去「何校、何音」，徒留「何評、補注」。筆者初步推測恐怕與當下能收集到的相關資料破碎與後續刊刻、校對之作業上有著一定的取捨；假設許異行取得何氏資料 680 條全數為真，其《讀書記》帙幅恐膨脹今存之數倍，且《文選》部分會佔據大多數篇幅，全書顯得不甚平衡。因此，《讀書記》刊出本就並非治《文選》之專書，而是如王應麟《困學紀聞》、顧炎武《日知錄》等一類，屬於個人的「讀書筆記」；《文選》只是何焯眾多學問中的一小部分，加上對校與讀書心得積盈較多，足以成章，謹此而已；再者，該書並非何焯筆記之原貌，「是知書非自訂而託之，後人多成增謗，少成減謗。」<sup>57</sup>後人蒐羅資料整理不甚臻緻，所以形成今本《讀書記》的《文選》部分，評論多於校勘，而原先應該要蒐集進《讀書記》的校勘案語，卻大多集於他人著作的奇特現象。

結言之，蔣維鈞與何氏子弟所收與清儒引用上有著極大的落差，代表何焯與《讀書記》之間是不能全然劃上等號，是可以確定的。且經本

---

司，2022 年 5 月），頁 14。

<sup>57</sup>（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 年 8 月），第八冊，頁 2054。

研究審視當時坊間流傳的諸多著作確實記錄落差、破碎不全；換言之，「何校」版本可能略行數種，即如許異行《文選筆記》、姚範《援鶉堂筆記》取得較早的何焯文獻，但因「家藏」之故而眾家無法看見；又如余蕭客《文選音義》受到四庫館臣的批評，其所收錄的何焯文獻鮮於清儒引用。因此，《義門讀書記》雖無法全然等於何焯，但其必定有部分來源始於何焯，兩者之間的關聯仍是可確定的。

### 三、汲古爲善：何焯考證《文選》版本問題

清代的《文選》版本觀念一直處於偏激的情況，而該風氣則是何焯「間接」引起的，源於何焯的底本選擇李善注本，更予以後學誤解的傾向。胡克家言：「《文選》之異，起於五臣。」<sup>58</sup>清儒至所以厭惡五臣，究其根柢有二：一是歷代學者認爲五臣在注解上抄襲李善，同時部分解釋未有依據，即謂「掩乎李注，實事求是處少，且多竊物雜揉之譏。」二是《文選》版本上認爲後續所出現的李善注本摻有五臣注問題，亦即「李注單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善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sup>59</sup>以客觀的角度來說，版本的問題不能全然究責於五臣，五臣雖有抄襲之慮，但造成「傳刻轉寫，動成舛誤」的刊刻錯誤則是後代「合併」所引起的（本研究引言已明）。<sup>60</sup>這個觀念直至民國初期，學者從日本與敦煌帶回大量

<sup>58</sup>（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頁7。

<sup>59</sup>（清）梁章鉅：《文選旁證》（道光十八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頁3-4。其實早在余蕭客的時代已質疑所謂的尤本並非單純的善注本，甚至清中葉後期的阮元在胡刻本刊世後，仍抱持「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的觀點。由於清代當時無法有更多的版本，也見不到敦煌、日本、韓國等區域收藏的版本，故當時認爲尤本，迨至後期的胡本均爲善本。當然，此問題據傅剛已反證以往學者之研究，認爲尤本可能不是純粹的單注本，而是一種以國子監本爲大體，旁參五臣本及六臣注本的「合成本」。參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6月），頁198-206、252-254。

<sup>60</sup>（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5冊，頁3。

抄本佐證才有所改觀。至此之前，清儒無從悉知；既無所知，只能仰賴六家、六臣本之「合併本」系統，明人楊士奇（1365—1444）〈文選跋〉明言：「《昭明文選》六十卷，唐六臣注，……獨賴此編之存。刻版在大學，吾家三十冊，初闕頗多，蓋借錄踰累年，歷數十家，猶未能悉補也。」<sup>61</sup>李善注本自北宋天聖年間敕刻後，官方再無此大型重刻紀錄；而新出李善注本需直至南宋的尤袤才再重新出版，且屬於私人刊刻；元代再由尤本分支張伯顏等本流傳至明代，當中其實已多有闕訛；而陳八郎之五臣本雖著實俱在，部帙尚整，但並非清儒之首選。故面對這般窘迫，讀書人不得已選擇合併本。

或許一個簡單的疑問：既然合併本有疑慮，五臣注又「俚儒荒陋」，何不選擇「李善單注」？確實，明代尚有唐藩、晉藩、汲古閣本等李善注版本，甚至清初康熙年間尚有新校的錢士謐本，於後再出葉樹藩本，但清儒已給出答案。許巽行言：

《文選》以李善注為善，李注以汲古閣雕本為善，上元錢士謐重校本，其尤善者也，然譌謬未正者甚多，且有汲古初刻不誤，而錢氏反改從俗本者。何義門先生有校本而未刻，近吳門葉氏刻之，與學者傳寫校本又多互異，而所校亦尚未盡。<sup>62</sup>

康熙至乾隆這段期間並非無舊版新出，乃是各版皆有謬誤，錢士謐標榜汲古閣本不僅有謬誤，甚至有「改從俗本」（從五臣本或合併本之五臣注）之舉；若何校本以錢本為底本，葉樹藩本更是未善盡再勘之責，反而「消江都原注，又綴以自添新注，非善本也。」<sup>63</sup>因此，清儒是在無力選擇的窘境，從中挑揀「尚可版本」。

---

<sup>61</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11。

<sup>62</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18冊，頁9。

<sup>63</sup> 許巽行：《文選筆記》，第18冊，頁21。

所謂校書非易事，刊刻劖劂更是。放眼整個清代《文選》注本的刊刻狀況，錢士謐本刊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葉樹藩本刊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最後胡克家本嘉慶十四年（1809），前後 123 年的時光，僅出三種刻本，可知該業之艱。何焯雖未出版，但卻開了一個重校李善注之先河，以錢士謐本為底本，對讎袁本（六家本）、茶陵本（六臣本）兩版，校正精詳，世稱「汲古為善」，為清儒所推究與徇從。<sup>64</sup>

既然何焯重校《文選》意義重大，又豈有批評糾正之理？「糾正何焯」的意義究竟為何？其實，何焯受批評正是源自「李善派」的批評。所謂「李善派」為本研究所假擬，其學術訴求即「以李善為宗」，不只版本追求「李善注本」，考據上更恪遵李善訓釋——「事必有徵，義必有本」的治學方法。而何焯正是沒有此清楚的學術傾向，故遭受詬病。本研究總歸原因大致有二：「校勘問題」與「治學之法」。

### （一）校勘問題

以目前現存的相關文獻來說，何焯從未表明要遵從李善注，或是欲恢復李善注。所以站在一個大時代的現況去設想，袁本（六家本）係公認明代刻書之精品，茶陵本（六臣本）亦元版明槧之主流本，兩版既已精詳，其實無須勞師動眾「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sup>65</sup>再校之，理更不遑論五臣本略被視作大眾讀物，更無校勘之必要。因此，以務實層面來說，選擇校勘當下學界所欠缺之李善注本（汲古閣本）是較符合學術價值與合理性。

但以乾、嘉之學者來看，既然何焯版本上選擇了李善注本，當以李善注方方面面為準。但是何焯在這部分上並沒有一致，而是有些依從五

<sup>64</sup> 胡克家：「世之所存，僅有袁本，有茶陵本，及次重刻淳熙辛丑尤延之本。」由該條可知，嘉慶年間仍徒存二版，未有新版，故僅以茲為讎。（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月），頁7。

<sup>65</sup> 此袁褫刊六家本之語。參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19。

臣、批評李善，如謝玄暉〈始出尚書省〉「防口猶寬政」評「善注全乖文意，劉良注得之。」陸士衡〈謝平原內始表〉「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評「李注恐誤。」等例不勝枚舉。<sup>66</sup>這使得「李善派」的學者嫌惡，如徐攀鳳提出〈西征賦〉「殆肆叔於朝市」从五臣作「騫叔」、〈河陽縣作二首〉「連陪廁王寮。」「連」，从五臣作「違」、〈入彭蠡湖口〉「水碧綴流溫」从五臣改「綴」爲「輟」等 10 條。又如許異行〈奉答內兄希叔〉「始斯」，从五臣，始當作如、「家臣」从五臣改家丞、〈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心悟」，从五臣依注作晤等百餘條。

上述列引並非要討論校勘上是否正確，而是透過何焯的校勘行爲進行反思。第一，爲何依從五臣本資料改正李善本？第二，何焯名面上以錢士謐本（汲古閣本）、袁本（六家本）、茶陵本（六臣本）進行校對，但版本來源有沒有問題？若依學者考據，清代皇家天祿琳琅藏的六家《文選》（袁本）10 部，之中 9 部受書賈變造仿宋槧之贗品。<sup>67</sup>而我們現在也知道宋代尤袤本的來源就是書賈，如果皇家所取得的版本都有可能爲贗品，那麼何焯取得的是否爲「有問題的版本」？或者更進一步問，清代究竟有多少版本是沒有重大謬誤的？筆者思索此議自不必言，流通的版本多半有誤，而清儒再以誤本改動正本？所校正的成果自當可想而知。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設。我們再進一步談，凡是校勘工作，皆須有理有據，如果何焯當時有交代清楚所取得的版本來源，校勘的改字是如何依據，並清楚留下校勘案語，即俗稱「校勘記」，或許清代學界不會有如此抨擊。

這也顯示，清儒所取得的資料並沒有太多資訊可以理解何焯爲何改字，即如前文所討論各學者間不論是否節錄「何校」，都沒有得到清楚地解釋改字之依據；或有「某本作某」之紀錄，那後續得到何焯文獻者是否直接逕自以茲改字，而造成版本更加絮亂？都是可以持續深究的問題。

<sup>66</sup> 《義門讀書記》，頁 933、951。

<sup>67</sup> 劉蕃：〈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 年 1 期（總第 42 輯），頁 309-316。

## （二）治學之法

誠如引言所引述：「方為有據、未免臆撰少佐證、<sup>68</sup>導人詞章固可，與之箋釋古人文詞則織。<sup>69</sup>」張雲璈：「失於點勘、<sup>70</sup>未翫賦之本文耶。<sup>71</sup>」黃焯：「時代高下之見」、「體裁濛溷之見」、「時文門法之見」等，從中可以掌握「詞章、體裁、時文」等關鍵詞，明顯與「評點」有關。因此，這邊即可大膽確定，批評者所對峙的文本係《義門讀書記》，非「何校」甚明。

《文選》評點類的用意清晰，目的是疏通文意，綴以訓詁、評論、補充等，如《重訂文選集評》：「足使人盡讀《選》，而不覺其詞義之艱深也。嗟乎！《選》可續經，評可輔註，江夏功臣其在是哉。」<sup>72</sup>《文選集成》：「總括大意，艱以議論，尤屬切要，非等卮詞。」<sup>73</sup>此輩學者治《文選》認為「求之注家，多不貫通」，<sup>74</sup>對於以往注解家「釋義忘義」，徒增解讀的困難性，並未起到疏解的作用而感到艱澀。故自是跳脫李善與五臣，許異行評價此類著作：

近時坊刻《文選集評》，芟蕪李注，雜採五臣。又以妄人所撰《文選音義》附之，支離乖舛，此書之危甚矣。又見一本名《文選集成》，移易次序，增減篇目，芟蕪李注，多加臆說，何近日妄人之多也。<sup>75</sup>

<sup>68</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91。

<sup>69</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96。

<sup>70</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 年 11 月），第 7 冊，頁 429。

<sup>71</sup>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 年 11 月），第 7 冊，頁 702。

<sup>72</sup> （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第 3 冊，頁 6。

<sup>73</sup>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第 1 冊，頁 24。

<sup>74</sup>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第 1 冊，頁 8。

<sup>75</sup> 許異行：《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20。

評點意即統括詮說，目的是疏通文意，自然不會如李善「弋鈞書部」。這種非考據的方法自然受到一部份學者的挑戰。因此，何焯在於《讀書記》所被詬病的面相，本研究認為有三原因：「方法」、「參考」與「判斷」。

第一，何焯治學的「方法」上並非倣從漢訓、漢法之「許、鄭之學」，意即「探討文字以許慎《說文解字》為依據；研究經學，便奉鄭玄的群經注說惟宗主。」<sup>76</sup>許慎、鄭玄皆為東漢著名經學學者，但兩者卻未嚴格兩漢家法與章句的淤說，<sup>77</sup>而是融會迄東漢以來的精說，披沙揀金，為兩漢以降最權威。<sup>78</sup>兩者在注釋的特色即在於「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先儒受教之術，經籍之樞要者。」<sup>79</sup>其實，對清儒來說，解經注疏要得是「有理有據」，而非「憑臆妄撰」。<sup>80</sup>但何焯訓詁上卻是偏向較為寬泛的「臆解」，如張衡〈西京賦〉「坻嵒鱗眴，棧齷嶮嶮。襄岸夷塗，脩路險險。」何焯認為：「觀此『嶮』與『險』，蓋兩義。」又或張衡〈西京賦〉「複陸重閣。」何焯認為：「陸」疑『陞』。」又或左思〈魏都賦〉「量寸旬。」何焯言「『寸』、『旬』未詳。」等，<sup>81</sup>甚至恣意改字。這些未加佐證或想當然耳的例子不

<sup>76</sup> 張舜徽：《鄭學叢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頁1-2。

<sup>77</sup> 按：漢代家法、章句的始末與今古派系過於繁複，此僅對峙何焯與清代治學方法論而稍做徵引。參徐復觀：《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196-204。

<sup>78</sup> 《後漢書》評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見（南朝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1月），頁325-326。

<sup>79</sup> 「信而有證，稽譏其說。」請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社，1013年5月），771。「先儒受教之術，經籍之樞要者。」請參（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頁1。

<sup>80</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212。

<sup>81</sup> 除張衡〈西京賦〉「坻嵒鱗眴，……。」可見於今本《義門讀書記》，參（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頁861；其餘例舉「複陸重閣」、「量寸旬。」不見於今本，需見於其他清儒著作，參（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第3冊，頁202、293。

勝枚舉。

第二，何焯「參考」五臣注的說法。五臣注解最大特色在於「串釋文本大意」，<sup>82</sup>而不在字句訓詁，因此對於文本的單一字義、出處典引列舉稍乏，甚至部分注解直採李善說法，讓不少學者覺得「荒陋、文本自明，無待辭費」。<sup>83</sup>這種荒陋感恰恰對於學問狂熱追求的清儒來說簡直無法容忍。在清儒眼中，既然身為注解家，不僅要搬出一套學問的「根據」或「來源」，更要處理「諸家不悟，皆彼之遺。」<sup>84</sup>的闕漏，不然何以從事注解？再進一步說，清儒希望看到得是《文選》中的「闕者補之，略者詳之，誤者正之。」<sup>85</sup>的學問，而非「憑臆妄撰」；因此，對於大家都知道的「常識」，不需要「此等故實，不必刻意求解，善讀書者自頌之。」<sup>86</sup>相形之下，何焯採用五臣說法而未詳加辯證，故而受此批評，如潘岳〈西征賦〉「殆肆叔於朝市。」從五臣作「騫叔」、潘岳〈河陽縣作〉二首「連陪廁王寮。」從五臣作「違」……等，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sup>87</sup>以上述「殆肆叔於朝市。」之五臣注為例：

翰曰：愎，很。四，捨也。任好，穆公名。言蹇叔之哭師，若值庸主自矜很戾，豈能捨蹇叔朝市之行哉，殆必殺之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sup>88</sup>

此為一標誌性的五臣注樣板，通注在於「串釋文本大意」而不詳加說明

<sup>82</sup> 劉群棟：《文選唐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頁214-228。

<sup>83</sup> 「荒陋」之語，上自東坡，下自清儒諸家均有此觀點，此不一一臚列。「文本自明，無待辭費」一語，可參《文選音義》，頁8。

<sup>84</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57。

<sup>85</sup> 文引自胡紹煥〈文選箋證自序〉，見（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聚學軒叢書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第12冊，頁207-212

<sup>86</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198。

<sup>87</sup>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頁872、915。

<sup>88</sup>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074。

「根據」或「來源」。雖然並非所有五臣注皆如上例，但對比此條的李善注全段既引《爾雅》、《禮記注》、《左氏傳》、《論語》、《史記》、《孟子》、《楚辭》、《毛詩》共八種文獻，五臣則顯得無理論根據。<sup>89</sup>而何焯對於這些情況均不詳加辯證求索，恣意採用，不甚嚴謹。

第三，「判斷」過於輕率。《文選》學包羅萬象，自上徵實，下啓課虛，內容體系龐大駁雜，非長久治《文選》者能觀出問題端倪。<sup>90</sup>何焯確實挑剔出有疑義之處，如〈東都賦〉「乘時龍」即引《後漢書注》與〈月令〉篇駁斥李善注的《周易》、〈子虛賦〉「織阿爲御」引《史記索引》補充李善注、〈景福殿賦〉「爰有遐狄」引《魏略》補充李善注。<sup>91</sup>然瑕不掩瑜，部分「判斷」過於輕率，如〈東都賦〉「險阻四塞。」擅將蘇代改爲蘇秦、〈魯靈光殿賦〉「蘭芝阿那於東西。」擅將伏儼改爲伏虔、〈五君詠·向常侍〉評喻擬陶潛說、曹丕〈雜詩〉疑奪嫡而作……等觀點，此不一枚舉。<sup>92</sup>

#### 四、事必有徵，義必有本：檢正何焯的時代意義

續接上文，欲理解清儒推崇與檢正何焯的意義，還是需要回到當下的時代背景。我們從文史上定義清代乾、嘉時期，往往會貼上「考據」的標籤，並伴隨的還有「校勘」。<sup>93</sup>清儒表現學問的方式恰恰兩存並行。

---

<sup>89</sup>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073。

<sup>90</sup>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月），頁2。

<sup>91</sup> 《義門讀書記》，頁860、874；同參《文選舊註輯存》之李善注，頁148、1546、2335。惟〈子虛賦〉「織阿爲御」條不存今本《義門讀書記》，但于光華《集評》、徐攀鳳《糾何》、張雲璈《膠言》均有收錄。

<sup>92</sup> 《義門讀書記》，頁894、931；〈東都賦〉「險阻四塞」、〈魯靈光殿賦〉「蘭芝阿那於東西」條不存今本《義門讀書記》，均無見於于光華《集評》收錄，但徐攀鳳《糾何》收兩條，頁201、209；張雲璈《膠言》談及「險阻四塞」，頁340；梁章鉅《旁證》談及「蘭芝阿那於東西」引何焯語，頁594。

<sup>93</sup> 乾、嘉時期的「考據」風氣，上溯江藩《漢學師承記》：「考鏡不足，儒罕通人。」認爲學問就是要「博」的清楚調門，與章太炎、劉師培、張舜徽論此時學術亦以「博」字形容，所申一致，因此關於乾、嘉清儒恪重考典以致「爭治」的學術成因，可以

當深刻觀察乾、嘉時期的各個著作，其實不難發現，社會所瀰漫的是「訓詁必以漢法，說經宗以漢儒」<sup>94</sup>的主張，所謂：「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蓋不取焉。……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騫仁義之塗矣。」<sup>95</sup>這樣「凡漢皆好」的研究基準是專峙於「經術」而言。因此，欲著手處理典籍，不論是經、史、子、集中的那一部，都必需恪守「有理有據」；再加上「正統派學風」<sup>96</sup>鼓吹之下，整體社會瀰漫「嚴謹」的治學法則，凡說法必需實據，否則即為「妄人」、「妄說」。這套治學方法尤其盛行吳、皖地區，兩域中雖有吳地以惠棟為首，皖地以戴震為首的說法。但統括來說，均錄於《漢學師承記》，足見治學上都是遵從漢學，貶斥理學一類的玄談學說。同理，《文選》不免在清代受諸此法，用於「詮釋」與「考據」，由於《文選》體系極為繁複，內容萬象，部帙龐雜，加上李善與五臣的注解詮釋不同，致使處理《文選》極具挑戰。<sup>97</sup>清儒以簡單且單一的視角「詮釋」《文選》——「以經訓藝。」<sup>98</sup>《選學膠言》言：

《文選》有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沉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奧。今欲於尋行數墨忠效愚者之得，不惟不值李氏一哂，直恐

---

蔽言之為「對學問的追求」。請參《漢學師承記箋釋》，頁14；章太炎、劉師培等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2-20、145-152。

<sup>94</sup> 此為筆者之言，概括清人代表性的觀點。

<sup>95</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24。

<sup>96</sup> 梁啟超對清代前期歸類十項治學之法，用以概括「樸學」。參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10月），頁52-54。

<sup>97</sup>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點出《文選》詮釋「正文」、「李善注」、「六臣注」的體系，以及歷代不同的需求層次。可見《文選》學的學問並非單一學術。但最主要在於如何「考辨訂補」，而清儒看見李善的方法與「訓詁必以漢法，說經宗以漢儒」相近，故以此發明，也順乎時代風氣。參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8月），頁118-119。

<sup>98</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頁201。

為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所詢，且祇被遺忘，非關著述，故既毀而復存。<sup>99</sup>

聖人跡行藏於五經，文學作品的源頭亦體現在五經，所謂「聖人之情，見乎文辭。徵聖立言，其文庶矣。」<sup>100</sup>不論是漢代的立博士官署，或是隋代四部分類，經學之地位無庸置疑，但後代總會將經學與文學兩分而疏遠，視作不同的學問，因此「後人莫窺其堂奧」。

誠如張雲璈等有清一輩，不僅視《文選》與五經地位同等，同時將經學與文學之間的關係繫聯更為緊密，即意味著一切的解答皆在經書內，是為「遵經」；而漢人「去聖最近」，<sup>101</sup>說法最為體貼，是故參考漢儒說法及漢人經訓之法，最能致達「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的漢儒師法，是為「崇漢」。故「遵經」、「崇漢」的影子露出，體現考證《文選》作品上既要理出經書的影子，更需以經傳、漢訓作為詮釋面向，才更能體現學問。

同之，徐攀鳳所言：「以經訓藝。」、「當引『經』，不當引『子』。」<sup>102</sup>的治《文選》觀點亦表明「遵經」立場。<sup>103</sup>徐、張的觀點並非空穴來風，

---

<sup>99</sup> 《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247-251。

<sup>100</sup> 按：劉勰不論是〈徵聖〉或〈宗經〉，皆重申為文不離聖人之言，而聖言存乎「五經」，以為立文創作之本。（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等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市：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17-18。

<sup>101</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1。

<sup>102</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67。

<sup>103</sup> 「遵經」自然是部分清人讀書之參核，但學者也並非迂腐，如班固〈西都賦〉「賓曰唯唯。」李善注引〈曲禮〉「唯而起。」，而徐攀鳳、張雲璈主當引《戰國策》，主因在於此處「唯」為一種應聲詞，猶今之「是、好、喔」等詞彙，而〈曲禮〉「唯而起。」倒偏於形容詞，與本意稍左；其次，「唯唯」兩字連用即以《戰國策》最早；故以此為注甚優。綜合上述兩點，清儒也並非昧從，而是俱有文意理解與時序判斷的科學檢則。參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頁 116；《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288。

其代表乾、嘉大部分學者看待文獻、處理典籍的視野，此類觀點又以江南地區尤盛；徐攀鳳出自松江（上海）婁縣，張雲璈江蘇仁和，遊歷江南後定居錢塘，均為江南一帶，固然受此風影響。

徐攀鳳言：「另作《糾何》一卷，遙質諸先生焉。」、張雲璈：「惜不令何氏聞之。」許巽行：「義門亦踵其失，故箸之。」<sup>104</sup>何氏出自江蘇長州，考據成績名重當時，是不少學者爭相效仿的對象之一，自然成為「受評量」的對象。可惜在於考據《文選》上不甚嚴謹，未達部分重視漢學之學者的期望，故於此嚴正批評與檢視，實與整個社會氛圍有密切關聯。

綜觀上述，清人對於治學的標準迥異於歷朝歷代，「一物不知，以為深恥。」<sup>105</sup>博通百家之學儼然成為一種新興的評量基準，尤其發表於士林間尤其是如此，皆必須掌握「實是求是，無徵不信」的治學理路。<sup>106</sup>站在乾、嘉清儒的治學立場，對與錯反倒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優先看到對方「明確汲引什麼文獻」，才進一步判斷說法的對錯與否及見識高低。何焯提出自身對於文章的賞析觀點，這個行為在其他清儒的解析並不是不可，這種方法影響後續《文選》學家甚多，諸如徐攀鳳、張雲璈、梁章鉅、朱珔、胡紹煥也於其作提出個人觀點。但在自身觀點提出以前，應當優先列舉「依據」做為說法佐證，次要才是自我的判斷案語。這也是近代學者總結認為何焯在校勘《文選》時犯有「求深穿鑿」及「妄改原文」；<sup>107</sup>或雖涉略廣博，卻都不精深的弊端所在。<sup>108</sup>

## 五、結論

《文選》學自唐代以來，對歷代讀書人的影響不亞於經學，尤其版

<sup>104</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 189；《選學膠言》，第 7 冊，頁 341-343；《文選筆記》，第 18 冊，頁 107-108。

<sup>105</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 37。

<sup>106</sup>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7 月），頁 84-95。

<sup>107</sup> 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9 月），頁 79-80。

<sup>108</sup>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頁 93。

本的刊刻複雜更揭示此書對於讀書階層的重要性。到了清代，治《文選》之風日盛，學者之間更是相互指批對方成果，學術的白熱化可見一斑。其中，清代又以何焯最為知名，不少學者嚮慕其成果，但凡考據引證當代學者說法，何氏之言必在其一，足見何焯為有清一代之治《文選》之隆正。

本研究即就於清儒既推崇何焯，又批評何焯之行為感到疑惑，故而在此現象上設計研究議題，除了希望可以借助本研究了解根本的始末外，也釐正清儒對於何焯是否有誤解之處。此題雖是初探，但目前成果已初步了解清儒對於何焯的誤解，係建立於後學編纂之《義門讀書記》。進一步統計集「何校」類著作與集「何評」類著作均有的偏頗與落差，此割裂造成後代的學者對何焯之謬誤。透過筆者客觀的立場，檢視清儒的批評之議，不僅為何焯平反，同時也理解清儒孜孜以求的學術境界，此對於清代《文選》學有著振警愚頑的刺激，也希望更多學者投入此研究之行列。本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大致歸納如下：

首先，根據相關著作的個別統計，了解何焯的《文選》學表現當有校勘、注音、補充與評點 4 種詮釋，但《讀書記》徒存補充與評點，不僅與士林流傳的資料有極大落差，且顯示編纂者蒐羅不全或有意剔除的疑慮；此舉不僅造成何氏的成果模糊，更讓清代學界認為何焯的學問殘缺不全。故透過釐正紀錄差異，了解《讀書記》雖無法全然等於何焯，但其必定有部分來源始於何焯，兩者之間的關聯仍是可以確定的。此也是本研究的優先動機。

其次，何焯校評《文選》一事，不僅是對一部龐大駁雜的學問進行梳理，更為清儒指明《文選》版本上之微瑕。對校上，首以錢士謐本、袁本、茶陵本三家進行處理，成果雖未完整付梓，卻瀰漫在各家著作之中；此舉，給予清儒未來考證方向作一定調。但不論是何焯本人或《讀書記》並未有一字一句行文刻意強調李善注的優越，反倒針對李善注之

不足、不詳而有所批評與補充，所以版本的選擇純粹是著眼時下的孤版，並非有學術傾向；但諷刺的是清代士林間訛傳何焯於「李注多所考證」<sup>109</sup>、「率以李崇賢注爲宗」<sup>110</sup>，錯誤的認知造成清儒認爲何氏應當遵循「漢學」的考據路線，而對其抨擊。

最後，了解整個大時代對於學問的風氣，即苛求於「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sup>111</sup>而注解的「首要目的」是在於「疏通文意」，「次要目的」才進一步展示「自我博學」，而非藉以注解之事來炫己博聞。然，清儒反道行之，首在揚己之博學，次於疏通，這也讓清代學者的著作多半部帙龐大，故對於何焯非「漢學」之法的批評也源在於此。

學者游志誠曾提出：

從徵實與課虛二法之相關選學者論述之，略可概括版本、校勘、輯佚，以及《文選》評點。文選學欲通而貫之，庶幾圓解，尚有待學界戮力以求，各法需兼顧，缺一不可，執偏亦難。故而試擬「文選綜合學」一詞以包括之。<sup>112</sup>

《文選》學並非單一學術，通帙包含歷代文人對於經典的轉化與詮釋，是一龐雜的學問。輾轉至清，清儒卻欲以「經學」對《文選》「再詮釋」，致使一部分清儒對於「李注」狂熱，墮入凡是「盡實」、「詳盡」的論述。而這種考據或可說爲讀書人「自卑心理」的歷史性格與「名人效應」的從眾心態。當然，每個人的學問是需要經過社會考驗、檢視與公評，一如今日。而文史上大部分學者天資聰穎，恃才傲物，彼此看輕對方學問

<sup>109</sup>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4月），頁30。

<sup>110</sup> 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學糾何》，頁189。

<sup>111</sup> 《漢學師承記箋釋》，頁88。

<sup>112</sup>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4月），頁17。

「其來有自」，所謂「同時之人，恒相輕蔑。」<sup>113</sup>最主要還是基於人（生物）最本初的「競爭心態」，尤其清代讀書人愈來愈多，各項學術大鳴大放，有志、有識之士爲了鞏固自我理念，良性者以周知師長、學侶過目，甚有不解處也會相互詢問；負面者輕鄙對方學問，相互詬端。但最終的共同目的還是在於確保自己的觀點「確不可易」<sup>114</sup>，無法輕易受他人質疑與挑戰。

## 引用書目

### 一、古典文獻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市：洪葉文化出版社，1013 年 5 月）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3 月）
- （南朝劉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等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市：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月）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攷異：《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4 月）
-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 年 5 月）
- （清）方廷珪評點，（清）陳雲程增補：《增訂昭明文選集成詳注》（清·乾隆四十八年吳天爵重訂增補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 9 月）

---

<sup>113</sup>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296。

<sup>114</sup> （清）江藩、趙之謙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 年 5 月），頁 509。

-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新北市：文海書版社，1988年3月)
- (清)朱珔：《文選集釋》(清·光緒元年涇川朱氏梅村家塾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4月)；(清)于光華：《重訂文選集評》(清·同治十一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余蕭客：《文選音義》(清·乾隆廿三年靜勝堂刻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汪師韓：《文學理學權輿》(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台北市：廣文書局，1971年8月)
- (清)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1月)
- (清)胡紹煥：《文選箋證》(聚學軒叢書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孫志祖：《文選考異》(清·嘉慶間刻讀書齋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徐攀鳳撰、李之亮校點：《選注規李》《選學糾何》，收於《清代文選學珍本叢刊(第一輯)》(鄭州：中洲出版社，1998年10月)
- (清)張雲璈：《選學膠言》(清·道光十一年刻三影閣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13年11月)
- (清)梁章鉅：《文選旁證》(清·道光十八年刻本)，《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9月)
- (清)許巽行：《文選筆記》(文淵樓叢書本)，收於《清代文選學名著集成》(揚州：廣陵書院，2013年11月)
- (清)黃侃：《文選平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

## 二、近人專書

- 王小婷：《清代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9 月）
- 王立群：《文選版本注釋綜合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8 月）
- 王立群：《現代文選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年 8 月）
- 王書才：《文選評點述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 范志新：《文選何焯校集證》（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 7 月）
- 韋胤宗：《浩蕩遊絲：何焯與清代的批校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 8 月）
- 徐復觀：《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張舜徽：《愛晚廬隨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 張舜徽：《鄭學叢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0 月）
- 章太炎、劉師培等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 傅剛：《文選版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年 6 月）
- 游志誠：《文選綜合學》（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10 年 4 月）
- 馮淑靜：《文選詮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 8 月）
-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 7 月）
- 劉群棟：《文選唐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11 月）
- 劉鋒、汪翠紅編：《文選資料彙編 序跋著錄卷》（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4 月）
- 劉鋒：《文選校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 9 月）
- 劉躍進：《文選舊註輯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 穆克宏：《六朝文學研究》，收於《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叢刊（第一輯）》（台北市：萬卷樓圖書，2018 年 9 月）
- 駱鴻凱：《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3 月）

### 三、期刊論文

丁旭輝〈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與背景研究的時代意義〉，《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2004年9月，第3期第10卷，頁109-120。

劉薔：〈天祿琳琅藏《六家文選》諸本版本實情探析〉，收錄《歷史文獻研究》，2019年1期（總第42輯），頁309-316。

### 四、網路資料

（清）方廷珪《昭明文選大成》（碧梧山莊本，1925年），收於台灣華文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book/NTUL-9910003664/reader>